

重点阅读

# 《同舟》：一部村史的书写

□艾克拜尔·米吉提

忽培元的长篇新著《同舟》可谓是一部同舟村的村史，也是一部家族史，同时，还是一部中华民族的交史缩影。小说从元末明初写到当下，由最初的段文海带着两个女儿段霞、段颖，用门板抬着从黄河边上救回来的巴特和布赫两兄弟开始，层层铺展，环环相扣，娓娓道来，引人入胜。这两兄弟在朝代交替的特殊历史时期只能隐姓埋名，取忽必烈的忽字为姓，更名为忽守仁、忽守义。由此，段文海将两个女儿许配给这两兄弟，在这里繁衍生息。

段文海年少考取进士，京城为官数载后，告老还乡。他家祖辈耕读传家，家风素以勤劳淳朴为本，崇尚仁义慈善。当他给4个外孙起名“承、季、师、汉”时就带寓意。忽守仁有一天在船上无事歇息琢磨，在他心中把这4个汉字连起来一念，竟然是“成吉思汗”，这才恍然大悟。从此，他对老岳丈更是感激无比，敬重有加。只是此种秘密，他从来不曾道破。由此可见，段文海老先生对于这两位女婿的身世是清楚的，更是尊重的。这种博大胸怀，对于后来忽家勤俭包容、温良醇厚家风的形成，无疑产生了深刻影响。段员外文海先生同女婿忽守仁、忽守义乐善好施的名声日渐盛起，越传越远。

随着岁月的流逝，段员外文海先生无疾而终，赓续香火、传承文化的重任落在忽家两兄弟身上。他们建起了段公庙，在平原上购地规划建设了忽家巷，亦即600年不散的同舟村之老根基。

新街巷的房屋分布，按照关中东府风俗规制。作者描述道：街道两边，皆为四面收水的标准四合院子，建筑一字拉开，家户兄弟面对面，排列的顺序，则是严格依照家族的长幼辈分谱系：忽守仁、忽守义主干以下，依次为承、季、师、汉四大门。四门之外，忽元莲、忽元岚此后分别嫁与赵家和文家，即在本巷西头，逐步建立起赵家巷与文家巷。为了不使段家绝门，守仁、守义两兄弟商量，把忽承舟的长子改姓了段，作为段老爷子的顶门长孙另立为户，在忽家巷西头延伸线上，肇起段家巷。作者说道：难怪至今有个说法：“600年前一椽椽，漂到西岸结姻缘。自古忽段不分家，再添赵文叫舅呀。”多么完美的一幅民族融合图，蒙汉两族、忽段两姓紧密地交融在一起，外加赵文两姓舅家，一幅一家亲画面展现在读者眼前，这是作品的一大贡献。显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历史经验共识和现实责任。

就是这样一个个同舟村里，忽段赵文四姓人家，断了骨头连着筋。600多年来相依为命，生活在一起。忽培元是有情怀有责任有担当的作者。他将笔锋一转，给我们展示了“欢迎乡贤回乡”的欢呼声中，赵志强“骑在一匹通体透红的蒙古走马背上，低头看见马鞍前面的雕花：一丛萧萧翠竹和一枝凌寒盛开的红梅。谁都知道，这是村里从前送兵和迎接军人立功喜报的专用坐骑呀。”这位社会学博士向研究所打了正式报告，回来长期追踪搞田野调查。他告诉父亲，他的导师当初一搞就是30多年，惹得父亲生气，并由此父子间产生误解，矛盾激化。但是，作为学者，赵志强每天做着他的《同舟日记》，记述着这里的一草一木，朝朝夕夕，风风雨雨，烟火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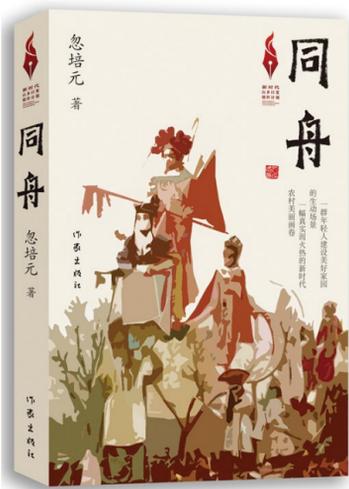
赵志强和他的同代人，开始对这块土地倾注感情和智慧。就像忽沛东本来在县职

校毕业后留校教书好好的，突然自作主张辞职回乡务农。反正不知为啥，他就是不愿意当教师，更不愿意漂泊在外打工。他只想回来，运用自己所学干点实事。的确，时代在变，那种曾经不顾一切背井离乡，离开土地去做农民工的时代在这方土地已然远去。小说作者敏锐地把握住这一悄然发生的时代变化，紧跟这些年轻人的步伐，挥洒自如地写出了这部厚重的作品。

请看作家笔下的描述：只几年的工夫，连灶火烧的都是天然气或自产的沼气。地下矿泉水，自来水管一直通到了锅台边上，再也不用到井上担水了。家家户户的住房都翻修一新或干脆盖了新房。墙上和地上都贴了瓷片儿，家具也全是新式的。过去有句口头禅，叫“秋风凉，光棍着了忙”，如今的同舟村光棍汉几乎看不见了。周围各村年轻的女娃，谁不愿意嫁到同舟村来？不少家庭，在10月1日国庆节那天参加村里举行的集体婚礼，都热热闹闹地娶回了漂亮的新媳妇。眼下的年轻婆婆也有了得力帮手，婆媳之间也不会因为穷而闹别扭或因物资匮乏发生冲突。这就是同舟村的现实，一片祥和，喜气洋洋。

一个古老的村子，生活着几千口人，其中每个人的喜怒哀乐、每一户人的悲欢离合，都是真实呈现。书中所反映的同舟村，就是一个600年不衰的中国北方农村社会的活标本，是一个充满了友爱亲情与矛盾纠葛的时代生活的缩影。十年间，作者以一个当代社会学学者、一个没有经验的村主任，和碰了许多钉子、好容易才进入角色的村支书的眼光，更是一个当代普通农民的眼光，长时间、零距离观察，深入体验思考，点点滴滴把他自己所思所想忠实地记录下来，这是忽培元给读者奉献的倾注心血之作。

小说中的这幅画面温暖人心：清晨，人



《同舟》，忽培元著，作家出版社，2024年5月

们聚在村口。秧歌、社火、健身操队统统都化装出动了。忽忽昌牵着他那匹轻善舍不得役使的蒙古大白马，配上祖传的红木雕花马鞍，等候在人群最前面。人们翘首以盼，迎接大家心中的亲人，赴京接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党支部书记、党的二十大代表赵志强。“欢迎咱的代表！欢迎咱的代表！”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赵志强的《同舟日记》也出版了，并获得“田园调查学术奖”，他在载誉而归的同时，向乡亲们举办了一个赠书仪式，同时带回中央民大的高才生忽晓刚，一个下定决心要回村的年轻学子。在众人热烈的掌声中，赵志强执意邀请忽晓刚一同骑上马背。在那一刻，他欣慰地意识到，同舟村今后的事业后继有人了。

《同舟》是作家忽培元经过10年准备，3年创作完成的心血之作，是深情描绘中国农村变革的厚重之作，作品已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重点推进作品，相信会给读者带来惊喜和感动。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影视文学委员会副主任）

书人絮语

# 边疆对自身的阐明

——读孤岛散文集《新疆时光》

□王族

到过新疆的人，他心里会装着一个他看见的新疆；没有到过新疆的人，他心里则装着想象中的新疆。新疆就是这样这样一个无论你是否到达，都会以外在景象吸引你，或者以深厚边疆文化力量震撼你，抑或以直接而刚烈的地域气质感染你，让你觉得自己的生命，注定要在新疆完成心灵蜕变，或者吸取精神和行为的双重力量，在新疆活出早先想象不到的人生。但是新疆同时又是遥远而又偏僻的，加之她因为地域和文化的特殊构成，所以对于抱着极大热情，不远千里奔波而来的人们而言，新疆常常展示出强烈的地域震撼，让到达新疆的人大为感叹新疆的辽阔和美丽。作为极具边疆特色的新疆，它对每一位到达者，都以“赠予”方式让他有看见，有感动，有聆听，有体验，等到离开的时候，在心里装下了一个属于他的新疆。

具体到一个写作者或者热爱新疆的人，譬如散文家孤岛，新疆之于他又会是怎样的个人际遇？或者说，当他在年轻时像大多数向往诗意的年轻人一样，从浙江远上西北以西的新疆，一待就是40多年，无论从户籍还是生活习惯，已完全变成地地道道的新疆人。孤岛在这样一种极具阳刚气质的环境中生活了这么多年，其江南习性已被新疆气息彻底改变。他深知自己正在自觉或不自觉被改变，于是他乐不可支地让自己沉浸于“第二故乡”“生命炼炉”“全新自我”的巨大嬗变之中，自觉接受了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冶炼。因为他在这样的际遇中感觉到了自己脱胎换骨的变化，所以他发出感叹：“江南是我母亲，大西北是我父亲”。这是一个写作者的警醒，也是一种自觉的自我认同。有了这样一种认同或总结，孤岛在他的散文写作中就有了清晰的精神指向。也就是说，他知道自己应当向哪个方向挺进，应该怎样写自己“在新疆”的关键所在，亦为我们了解他的散文提供了确切的判断切口。

散文集《新疆时光》从内容取舍、文本结构到表达取向，对新疆散文都有很鲜明的意义。也就是说，如何确立散文中的新疆，或者如何确立散文中的“我”，不仅仅是写作问题，还是一个人精神在场，或者安放灵魂的问题。孤岛找到适合散文写作的方式，以“山河魂魂”“丝路沧桑”“城市与人”3辑，完成了这部散文集。在书中，孤岛一直以一个江南学子的心态和眼光，去感受新疆外在在大美和内在道德精神，让“我”与自然合一，美与崇高合一。孤岛作为到达者，自觉地让自己成为精神抵达的体验者和见证者。譬如他写到塔里木河，就独辟蹊径地肯定了这条河的独立精神（不愿流入水多的大海），并且写出它的感恩情怀、殉道精神等等，不一而足。因此，塔里木河就是极富人格化的河流，是孤岛理解并且拥有的塔里木河，或者说孤岛借塔里木河抒发，表达了“我”，让塔里木河因为“我”有了思想情怀，从而“耸立”起来，成为一种精神象征。书中写了著名探险家余纯顺和刘雨田，对他们勇敢穿越荒原，用双脚书写大西北的勇士精神、探索精神、人与自然和谐精神，都进行了淋漓尽致的书写。

散文集中涉及了新疆诸多物象，其生命状态和精神状态对孤岛是一种印证。孤岛在多个特殊场景（草原、沙漠、牧场、河流、山峦、绿洲、村庄）的到达，其实是一种确认，因为地域像一个人一样，是敞开着拥抱期待心灵的，这时候孤岛的到达和个人的灵魂信息，就显得尤为丰沛和深情。地域和物象与孤岛一起呈现，彰显出物与人、天地与万物互相依存、互相影响的古老例证。因此，孤岛散文中的新疆，便不是单一的风光新疆，而是凸现精神光芒或心灵力量的新疆。孤岛不停地从散文中寻找“我”，所以他的情怀和感情方式，与天山南北相对应的同时，亦显得丰沛和真挚。或许一个人在新疆行走和到达，然后写下散文，都会让心灵和灵魂达到确切慰藉。孤岛的每一篇散文中都活脱脱地呈现着一个到达的“我”，其后立着人的品格。无论在怎样的境界，说出怎样的话；无论奔赴向某一个具体场景，或深入新疆人的具体生活，再或者无论是沉浸于哪种历史、文化和民族，孤岛的情绪都浓烈奔放，富有个性化见地……这是孤岛散文艺术的独特风格。他将江南的清雅、灵秀与聪颖，与西北的豪放、气势和风骨揉为一体，使此散文集体现出难能可贵的优美阅读体验。

（作者系新疆作协秘书长）



《新疆时光》，孤岛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24年5月

# 文学如何讲述“科学”？

——评李静的《赛先生在当代：科技升格与文学转型》

□李玮

李静的最新著《赛先生在当代：科技升格与文学转型》超越了“科学”“文学”的二元结构，如书中所说：“理性与道德、知识与正义、科学与文化是一体两面的，而非彼此孤立。”当李静将视野投向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和2016年以后的移动互联网时代这两个“科技升格”时代的文学时，“科学故事”这一研究对象指陈的就不再是文学中有关科学家、科技变革和科学观念的叙述，而是通过谱系梳理，在文学的“功能性”之外聚焦文学叙事与科学话语之间的内在张力与隐秘联系，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配合、互动如何参与并推动了改革开放时代的历史进程和社会观念的转型。可以说，李静所选择的这7个“科学—文学”故事可以作为我们认识当代中国两个科技巨变时代的方法和媒介，帮助我们理解改革开放时代科学主义的兴起、演变以及其间40余年来中国社会的整体变化，这其中凝聚着的恰恰是丰富的中国经验。

在对《乔厂长上任记》等蒋子龙工业题材小说的分析中，李静注意到现代管理科学在实际落地时与中国人情社会中的“关系学”和“官场哲学”所产生的冲突，意识到这不仅仅是“方案—实践”层面的矛盾，而是借由这一冲突审视资本主义管理经验与“苏联模式”及传统社会主义文化之间的矛盾，并透过文学作品呈现出的这种彼此交织的角力场回顾和反思新时期科学与文学之间的复杂张力；通过对比《哥德巴赫猜想》等同时

期相似主题报告文学的书写方法与形式特征，李静勾勒了一条“科学家英雄”进入当代史的路径，而围绕着彼时“向科学家学习”所产生的关于“学习”和“个人成长”的思考，则进一步指向当下市场经济时代弥散在青年群体中的“成功学”想象与整体性焦虑，因而不同时期有关《哥德巴赫猜想》写法与主题的解读始终指向人在当代社会的生存问题；而对于科幻畅销书《小灵通漫游未来》中未来想象的解读，实际隐含着历史转折时期对于发展道路的现实选择和规划，其中涉及的生产力变革、物质/精神需求以及劳动者价值等问题无一不是指向改革开放初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围绕这些“科学—文学”故事，李静一方面重返历史现场，在转折年代的历史语境之下分析文学叙事如何作为一种话语参与科学/改革合法性的建构，另一方面又不仅仅满足于“历史化”，而是循着这些故事的脉络考察它们所表征的思想症候如何经过40余年的历史演变影响当下，特别是对中国社会的整体思想转型起到了何种影响。与其说李静是在既定的研究目标下寻找“文本”，不如说是其置身于改革开放的历史中发掘、解读和制造关乎现实与人之发展的“命题”。

李静开展研究与批评的“作业现场”和“文学田野”超出了既有的文学体系和范式，除了传统的文学作品的分析以外，将弹幕、音视频、公众号等新媒介文艺形式纳入文学研究与批评的范畴中，在融媒体时代以“沉

浸式”的方式展开置身事内的跨媒介学研究，因而，李静的这一系列论文呈现出强烈的在场感和行动性。同时，李静冷静、客观地审视和分析资本、技术、媒介、大众等全新的文学生产要素对文学生态、大众文化以及国民精神产生的影响，对当下各种时兴的新媒体文学现象开展症候式批评，对其中隐含着的真问题展开针砭时弊的分析与批判。正如李静所言，“在数码文明转型的时代中，科技的重要性已不再需要文学的‘游说’，科技已经融入身体经验，作用于环境本身，科技、资本与民族国家深度绑定”。因而在新的市场化环境和媒介语境之下，如何处理更为丰富驳杂的文学生产要素，厘清“文学”与“科学”的密切联系是媒介变革时代的文学研究需要格外注意的地方，“文学”与“科学”不再是毫无关联的两极，也不再是“文学”作为一种学科建制单向地受到科学性的影响，而是二者越发呈现出“同构关系”。如李静所指出的，二者“扭结为一对相互依存的矛盾共同体”，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深层次变化是内化于当下文学的表现形式和整体性生产机制中的，而文学生产的各个流程和要素也表征着科技的进步和媒介新变。

在对微信公众号“为你读诗”读首诗再睡觉”的文化症候分析中，李静从场景与意象的营造、听觉、情绪等角度对此类公众号的“诗意生产方式”进行剖析、总结和归纳了其背后的生成机制和当前国民文化生活与

# 在历史旷野中飘逝与浮现的传奇

——评长篇小说《风吹白羽毛》

□兰凌

中挖掘题材、素材，力求以白马部落风土人情涵养小说的一种野性美。

陈霖并不拘泥于传奇传统“以人系事”的缜合结构模式，而是以酣畅淋漓的笔墨，在小说中较为集中地刻画了一个“准”中心人物白雄。小说以白雄一家三代人为纽带，有机地缠绕着白马土司王秋园、老番官杰瓦、老白该（巫师）才介、雅日块寨头人玛格、袍哥龙文彪、“背脚子”古老三等各家几代人的数条线索。对传奇文体的化用，正是作者文学观的独特呈现。白雄的名字即是作者为增强小说的传奇性有意设置。小说中厄里寨头人格庄为教儿子“其汝”（白马语“狗崽子”的意思，白雄出生时的名字），根据才介所示“神意”，他必须去猎获一只“白熊”，而且“其汝”也要改名为“多嘎”（白马语“白熊”的意思），其意思就是换命。“其汝”的命，最终为西药所救。洋人的丹药和

洋枪，一种现代性意味的强力冲击，就这样从作者的笔端自然而然地来到了晚清的岷山深处。叛逆少年“多嘎”在离家出走后，结识了自幼喜读《三国》《水浒》，后来成为中共党员的“背脚子”兄弟古老三，在做“背脚子”的行走中，他见识了白马部落之外的汉族世界，于是听从古老三的建议改为汉名“白雄”，在风里雨里，两人不仅相互帮助，还一起合力杀过遭遇的劫匪，白雄成长为白马部落英雄的“传奇性”就由其名字的转换巧妙牵引出来。其他人物群像，有的展现了彪悍暴烈的血性男人，有的塑造了美丽坚韧的野性女人，各有重点、高峰，都具有“传奇”色彩。

白马部落是以狩猎为生的深山原始部落之一，小说中写了3次令人印象深刻的狩猎活动，第一次是猎白熊，后两次与爱情有关。出现在小说第十章的第二次狩猎，作者是为了证实，年轻

巫师托塔塔对艾玛的单恋是一厢情愿。他打算去猎狗刚给艾玛做一件毛皮背心以表爱意，但在狩猎失败之后，他对艾玛的爱也以主动退出而告终。第三次出现在小说的第十一章，白雄为确保其权力的延续，不惜亲手毁掉女儿的爱情，艾玛于是报以反抗，她要求父亲指定的未婚夫帕格去猎取“麝香”，婚后生的艾玛，麝香不离身，她决绝地不让自己怀上帕格的孩子。狩猎活动的描写是非常写实的，猎手如何追踪、如何潜伏、如何用“啄啄枪”射击，如何使用葛麻麻绒做成捻子（引火线），以及可以从使用中闻得到的树木、野兽的不同气味等。在叙事功能上，这两次狩猎活动具有显而易见的象征性。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浪漫的爱情往往败于残酷的生存需要。比如白雄，为当上番官，他居然选择比其母亲还大几个月的老番官遗孀秦曼早做妻子，这一情节取材于

一段真实的白马往事，但荒诞得如同传奇。

在小说的历史书写中，陈霖精心描绘表现白马人生存意志的种种细节，在白马人反抗土匪、国民党中央军的暴力和掠夺中，白马人爆发出惊人的骁勇。格庄为母报仇猎杀匪首吴麻子，白雄为父报仇手刃匪首朱天棒。头人玛格为救妹妹奥姆，手攥石块从大树一跃而下，毫无畏惧地击穿了国民党军官赵振贤。作者刻意地发掘出白马人充满血性和传奇般的行为，这片古老大地蕴藏着强烈的生命力和被提炼出来，白马部落的民族灵魂通过反抗的意志得以彰显。

20世纪上半叶，曾经世外桃源般的白马部落，随着枪炮、鸦片、强势力，充满了权力的倾轧、暴力与杀戮。枪炮与鸦片加速白马土司制度和白马部落的内部衰朽，白马部落的淳朴“人心”迅速崩溃。小说虽以白羽毛的飘逝意象结尾，但是作者不会让绝望的力量压倒白马人，白雄外孙“解放”的出生，象征着白马部落的希望。《风吹白羽毛》这部小说以“讽喻”为深层主题，以时代转折写“人心”之变，以“风土”为质感，以“传奇”贯通，它曲折丰富又舒卷自如，这是一部属于白马人的史诗，其实，它早就存在于历史之中。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副教授）



《风吹白羽毛》，陈霖著，四川文艺出版社，2023年10月

陈霖的长篇小说《风吹白羽毛》讲述了20世纪上半叶四川龙安（今平武县）白马部落番官白雄传奇的一生，小说以小人物的命运沉浮书写大时代的历史激荡，为当代读者了解岷山深处的古老民族提供了一条奇幻迷人的文学路径。陈霖扎根白马十多年，从新寨子到老寨子，挨门串户，敲门、聆听、收集，一往情深地在白马人的口述故事